

阿拉伯变局的发展趋势

文/刘中民



2011年8月25日，利比亚反对派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的阿布萨利姆地区。利比亚的形势变化构成此次中东变局中的一个典型类型。图/东方IC

半年多来，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阿拉伯国家政治和中东地区格局均处在深刻的变动与调整之中，其地区影响和国际影响也处在进一步发酵与扩散之中。尽管当前西亚北非地区形势的发展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但其未来发展也已经显现出诸多可以洞察的若干走向。

三大核心问题决定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转型

从总体上来看，阿拉伯国家将进入到全面变革与调整的时期，其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民主化问题

在未来的发展转型中，民主化无疑将成为中东国家政治变革的主流。无论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还是现代的共和制国家，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政治变革都将成为大势所趋，但中东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民主，而是实现具有各自国情和特色的民主。

对此，有评论指出，“2011年

的反独裁斗争终结了阿拉伯民族和穆斯林与民主观念格格不入的观念”，

“不管变革中的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如何发展，即便很可能许多国家仍保持着那种在西方看来不完全民主的统治模式，对民意和民众的重视程度都会上升”。但是，可以预见，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中东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复杂的部落、教派等因素决定了中东民主化进程将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长期过程。这也恰如相关的评价所言：“突尼斯不会像法国一样，而埃及也不会变成瑞士。不要期待发生划时代的变革。在阿拉伯世界将维持缓慢发展的半传统社会，传统和现代化的对立将加深。”

另有人悲观地指出，“阿拉伯革命的被迫性、不成熟、被形势所迫和相互影响的特点使人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迫切任务可能不是消灭专制，而是修复专制”。

世俗化问题

在此次西亚北非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宗教因素并不突出。因此，世

俗化在阿拉伯国家未来政治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应得到进一步加强。对此，有评论指出，阿拉伯“起义者不希望未来国家模式成为伊朗霍梅尼式神权模式，而是成为土耳其式的民主模式”。但是，随形势的发展演进，伊斯兰势力逐步增强的趋势在部分国家已经显现，尤其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

有预测指出，在埃及“可能上台的不是宗教狂，而是相当温和、稳重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将在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总体来说，中东不会出现整个地区性的伊斯兰复兴，但在宗教因素在未来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仍不容忽视，教派矛盾和宗教极端组织在巴林、也门、叙利亚等国家的影响也不容低估，如何祛除宗教政治化尤其是极端主义化，仍是阿拉伯国家必须面对的难题。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此次中东的民众抗议浪潮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反西方的色彩相对淡薄。因此，有评论指出，在此次中东变革中，“要求自由、尊严、公

正的思想已经取代了曾经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旗”。即使在西方军事打击利比亚以后也没有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规模的反西方浪潮。因此，当前中东国家的社会运动更为关心的是自身的命运与前途问题，而不再像历史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一味将反西方作为其核心价值诉求之一，它力图通过包括思想和制度改造在内的自我救赎，实现国家的再造与民族的复兴。

近代以来，反西方几乎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的核心主题之一。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到霍梅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乃至拉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尽管它们之间也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但它们却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并且多把西方的侵蚀作为伊斯兰世界落后的根源之一。

当前中东的社会运动具有明显的淡化反西方色彩的特征，这或许是中东社会进步的征兆之一。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阿拉伯国家如何处理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中东伊斯兰国家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主体性建设，真正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才能更加自信地面对西方。

四类代表性国家是中东国家转型的关键

从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的持续动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仍难以消除。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其情况将有所不同。以下仅就若干典型国家略作分析。

埃及：从率先发生政权更迭的突尼斯和埃及情况来看，它们尚处在进一步变革之中，尤其是埃及仍无法排除发生“二次革命”的可能。当前埃及的政治生态十分脆弱，各种政治力量的竞相角逐，时有发生游行

示威，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和宗教冲突，内政外交转型的巨大压力，都使埃及仍然有陷入严重动荡的可能。

从目前的态势看，由原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演变而来的“新民族党”，由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和正义党”，由各种分散、多元的力量构成的自由派三大政治势力，将对埃及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由于较成熟的民族认同和较强的国家凝聚力，埃及和突尼斯并不存在内战和分裂的危险。

利比亚：利比亚的形势变化经历了从政治抗议到内战，再到外部干预引发局部战争的发展过程，构成了此次中东变局中的又一典型类型。在西方军事介入利比亚危机后，经过数月的胶着状态与军事拉锯战，利比亚局势愈来愈向着有利于反对派的方向发展，班加西“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外交与军事优势不断巩固，卡扎菲政权的垮台已成定局。当前，尽管卡扎菲政权垮台的前景愈加明朗，但未来利比亚的政治发展前景仍然扑朔迷离。

利比亚发展趋势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北约是否发动地面战争、美国介入利比亚问题的力度、政治解决利比亚危机的进展等。由于历史上的地方割据和部落矛盾，利比亚既存在因素马里化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能，也存在因苏丹化而发生东西分裂的可能。从内部因素看，东部反对派势力是否有能力领导利比亚走向统一和稳定是决定利比亚命运的重要因素。对此，人们多持怀疑态度，东部反对派力量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无法确定东部的反政府武装是否想要，或者说要努力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以巴林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在海湾国家中，巴林什叶派的反政府活动构成了该地区抗议活动的典型代表。在本质上，它反映了沙特主导的逊尼

派与伊朗主导的什叶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因此，沙特主导的海合会通过经济援助和军事干预对于平抑以巴林为代表地区的抗议浪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影响海湾国家局势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和西方的政策，西方虽在舆论上要求海湾国家加大改革力度，但在实际上默许了海湾国家对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其原因主要在于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现实利益考虑。因此，海湾地区的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将维持相对平衡，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不大。

也门和叙利亚：它们是当前形势较为严峻的两个国家，其形势与战争爆发前的利比亚局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并将持续动荡，但基于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西方军事干预的能力和信心不足，酿成较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两者都有走向内战的可能，尤其是也门。

叙利亚的复杂性在于它几乎与中东的一切问题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它因戈兰高地问题成为阿以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方；它因与黎巴嫩的特殊关系，以及充当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联系桥梁而成为“新月地带”的地缘政治枢纽；它作为俄罗斯在中东的唯一盟友可以撬动美俄关系；它还是土耳其扩大在阿拉伯世界影响所倚重的力量。

因此，有评价指出，“作为中东的一个关键国家，动荡不安的叙利亚正在以埃及革命都不具有的力量和方式震撼整个地区”，这也正是西方在叙利亚政策上犹豫不决的原因所在。也门形势的动荡与部落冲突和“基地”组织渗透有重要关系，目前已濒临内战的边缘，但其重要的地缘位置以及在全球反恐斗争中的突出地位，将促使美国 and 沙特等国家对其形势发展密切关注，并在必要时施加影响。

◀ 曾经的政治强人卡扎菲处境不妙。
图/东方IC

五种因素搅动中东地区格局

当前，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以色列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土耳其和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增强，沙特与伊朗矛盾加深等。此外，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问题和伊朗核危机等热点问题的发展也进一步复杂化。

中东变局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由于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地位将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埃及传统大国地位进一步衰落，利比亚问题导致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尴尬处境和无所作为，都是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的体现。有观点认为，未来的阿拉伯世界有可能分裂成两大阵营，即“富有影响的阿拉伯君主国精英俱乐部”和“民主运动已经取代或者试图取代腐败独裁专制的国家”，而“新的集团的形成使阿拉伯联盟失去价值”。但是，从阿拉伯世界次区域的角度看，沙特领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巴林危机的干预，对埃及等国家的援助等行为表明海合会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呈上升态势，而卡塔尔和阿拉伯的活跃外交也值得高度关注。

中东变局对以色列的周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为最早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变革将对以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继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之后，埃及关系再遭破坏乃至美以关系遭到冲击都将使以色列更加孤立。埃及开放加沙的拉法口岸、斡旋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和解、与伊朗改善关系等，都引起了以色列的忧虑。



此外，伊朗地区影响的增强、叙利亚的动荡局势、黎巴嫩真主党作用的提升都进一步恶化了以色列的周边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以色列已经认识到中东地区的“政治战略环境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演变”。

中东变局使土耳其的地区影响上升。中东变局导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发生严重危机，土耳其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中世俗化、民主化的典型代表，其发展模式将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土耳其兼备伊斯兰和世俗民主国家的特性有利于其施加地区影响力”，从外交角度看，土耳其对利比亚危机的斡旋以及近年来加强参与中东事务的外交调整，尤其是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调整，都使土耳其的地区影响不断上升。此外，土耳其作为叙利亚的重要邻国和西方的重要盟国，无疑将对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发挥重要作用。

中东变局使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在阿拉伯国家抗议浪潮的影响下，伊朗也一度发生民众抗议浪潮，但并未对伊朗现政权产生严

重冲击。由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略收缩，美国等西方大国力量受利比亚战争的牵制，使西方在短期内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伊朗“拥核崛起”的信心更趋增强。伊朗通过巴林对等海湾国家什叶派的政治渗透也增强了其地区影响。伊朗与埃及关系的改善、与沙特等海湾国家政治较量的复杂化及其与以色列矛盾的激化将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东变局导致地区热点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巴勒斯坦内部实现了和解，但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的矛盾依然存在，以色列的强硬政策并未改变，多数阿拉伯国家无暇他顾，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都使巴以和平的前景堪忧。其原因在于，“阿拉伯造反在很大程度上无视阿以冲突。但造反孕育出的政权可能更加敌视以色列。这些政权可能被打上一种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印记。它们不会把来自西方的指令当回事，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会对美国和欧盟更加强硬”。

在伊朗核问题上，伊朗的政策更趋强硬，使短期内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景更加渺茫。对此，有美国学者悲观地指出，“阿拉伯之春或许很迷人，但却不一定长久。可悲的是，伊朗的霸权威胁却看起来更为持久”。在伊拉克问题上，海湾周边国家教派矛盾加剧与伊朗政治渗透相结合，有可能加剧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在阿富汗问题上，在美国击毙拉登事件的刺激下，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报复性恐怖袭击呈大幅上升的态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